

# 历史社会学视野中的 “人民”话语：表达与实践

刘 杰 贺东航

摘要：人民话语是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话语。这一话语形态衍生自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动员，并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与改革时期的社会治理。从历史社会学即注重考察政治话语与政治行动互构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修辞的人民话语在道德、权力与治理三个层面于各个历史时期皆有对应的实践。在革命时期表现为阶级动员、革命行动与基层政权实践；在政权建设时期表现为诉诸文化领导权、继续革命与总体性治理；在改革时期表现为历史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维稳体制的形成与动员式治理风格的兴起。

关键词：历史社会学；人民；革命；政权建设；改革

DOI:10.13658/j.cnki.sar.2017.06.001

作者简介：刘杰，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贺东航，厦门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1569(2017)06 - 0001 - 07

“人民”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人民”所指为何，似乎很难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与定义。以往的研究要么将“人民”话语的出现作为一种政治正当性问题提出<sup>①</sup>，要么强调人民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政治修辞，将人民塑造为一个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具有正当性化身的概念，象征着历史前进方向的阶级化<sup>②</sup>，要么将人民视为一种指导社会行动的话语，并与“群众”概念等同起来，从而赋予群众以现代性品格，使“人民”在权力归属和道德评判上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sup>③</sup>，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自我认知的“阶级性”与排斥敌人的革命性。可见，“人民”话语既具有合法性层面上的政道意涵，也具有权力技术层面上的治道意义。

① 在古典政治学时期，政治思想中的“人民”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政治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含义，因为古典政治学从“自然法”“神学”等角度赋予了政治统治与政治共同体以天然的正当性，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如此。随着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诞生，因此人民主权与社会契约学说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的起点问题。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页。

② 例如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主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将人民塑造为一个具有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具有正当性化身的概念以及象征历史前进方向的阶级化概念。

③ 这与“群众”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西方思想家的观点对“群众”的概念持有鄙夷的态度，从托克维尔到阿伦特，都对“群众”多有批判，可以总结为缺失独立人格、非理性和情绪化、破坏性和屈从性以及道德水平低下等。其中最为著名的论断要属勒庞关于“群体是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的表达。十九世纪中叶之后，随着工人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崛起以及资本主义带来贫穷、道德败坏，群众观念逐渐摆脱了之前的贬义形象，进入了社会政治理论的核心论域。例如列宁就指出，“数以千万计的群众——哪里有千百万人，那里才是真正政治的起点”。

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纵深来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人民”话语是理解中国从革命、政权建设到后革命时期改革的重要脉线。我们将“人民”话语界定为一直以来中共革命与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所抱持的主导意识形态。然而,鲜有研究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一话语形态在历次政治时期所扮演的作用,因而本文试图将其放置在革命行动、革命进程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野中来考察,考察一种意识形态或修辞表达如何与政治主体(精英)、政治行动与政治结构在历史情境中开展互动。

在历史社会学家那里,意识形态与革命、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得到了丰富的阐释,例如小休厄尔(William Sewell)、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等历史社会学者对以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进路予以了批评,认为后者对法国大革命等重大政治进程的分析忽略了意识形态维度;而法国大革命的进程表明,政治行动不仅是客观性社会利益的某种反映,还体现了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起,必须关注在其中塑造出革命实践的那些范畴。<sup>①</sup>同时,戈德斯通指出,在旧制度崩溃过程中,意识形态扮演的主要是支持性角色,只有当国家崩溃肇始之后,在权力斗争和国家重建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才能发挥主导作用。<sup>②</sup>在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那里,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与经济(Economy)、军事(Military)、政治(Politics)相比肩的权力来源之一,四者构成了用以分析革命进程、国家建设的IEMP模型。<sup>③</sup>

借助这一理论脉络,本文着力于解决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政治语境中的“人民”话语是由哪些分析层次构成的。其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民”话语,分别在中共革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以及改革时期,如何使政治行动、政治结构产生互动,道德、权力与治理产生互构。最后,“人民”话语对当前国家治理语境中有何启发。

## 一、“人民”话语的分析层次

“人民”话语多样且丰富,然而,任何一种政治修辞,都有类似于某种认知范式那样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所区分。基于此,本文将“人民”话语归为以下三个分析层次:<sup>④</sup>

(一)道德层次。这是关于“人民”话语的“本体论”问题,关乎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这一层次主要是通过其有关群众观点来呈现的,而主张“群众观点”的往往是克里斯玛式人物,他们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混合在一起,<sup>⑤</sup>并且在改造社会方面抱有强烈的使命感,进而赋予“人民”话语强大的使命感。这种道德层面包含两个部分——“专断的”与“疼爱的”。“人民”话语的掌握者宣称自己是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的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成长肩负起职责,<sup>⑥</sup>既可以做出惩戒,也可以教化,构成了一种“长老式权力”。正是“人民”话语使革命教化机制与目标群体之间构成了双向生产机制,前者对后者产生支配与规训,后者为前者

① William Sewell, “Ideologi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57, no. 1 (1985), pp. 57–85; Jack Goldstone, “Ideology, Cultural Frameworks, and 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Theory & Society*, vol. 20, no. 4 (1991), pp. 405–453.

② 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延杰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02页。

③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30–37页。

④ 陈明明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时,将其分为价值-信仰部分、认知-阐释、行动-策略三个层次,本文受此启发。参见陈明明《从超越性革命到调适性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⑤ 韦伯指出,一切以伦理为取向的行动,都可归并为两种准则,其一是责任伦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另一种是信念伦理(ethic of conviction),两种标准本质上存在差别和冲突,前者侧重于“信念”——行动者的心情、意向、信念的价值,使行动者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后者侧重于“责任”——行为的后果,行动者要义无旁顾地对后果承担责任。参见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⑥ 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

提供正当性基础,从而在道德与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不断强化的循环关系。

(二) 权力维度。所谓的权力维度,是一种意识形态经由对历史与现实的阐释与操作继而形成员工、指导、组织一定行为的过程。迈克尔·曼指出,我们不能仅凭直接感受认识世界,需要超越感受的意义概念和范畴,无论是韦伯所称的“掌握基本知识和意义的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还是涂尔干关于“稳定有效的社会合作需要对规范的共识”的判断,都在力图证明,旨在强化集体信念的意识形态运动能够增强它们的集体性权力,因此对某种“规范”的垄断也是获得权力的重要路径。<sup>①</sup>“人民”话语作为在革命进程与国家建设进程中用以构建集体信念网络的意识形态,也获得了巨大的权力。首先,“人民”话语导源于阶级史观,因而内含着“人民”(革命者)与“敌人”(反革命者或反动派)的对立。其次,在这种对立之间,划分标准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人民”与“敌人”的界分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中,取决于政治性的需要。<sup>②</sup>最后,“人民”中的单个个体无法独立面对国家政权,不能以个体身份与国家展开交涉,由此为革命团体保持忠诚以及之后国家提升专断性权力提供了基础。

(三) 治理层面。“人民”话语不仅仅是一种道德律令和权力生产机制,还是一种治理技术,表现为以“群众”概念为指称的治理模式。从革命年代开始,“人民”话语担纲着动员、规训、道德生产、阶级识别、精英训练等方面的重任,并在基层治理层面表现为以“群众”为要旨的治理方式,比如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代表的政法传统,构成了中共边区治理的重要特征。在国家政权建设时期,政党继续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通过发动“忆苦思甜”构建民众对新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还形成社会动员,从而为经济重建乃至之后的“阶级斗争”提供支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人民”话语直至当下都保有丰富的遗产。

## 二、“人民”话语的历史实践

依照通常的历史时期分类,本文将“人民”话语的历史演化分为革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时期与改革时期,并根据前文对“人民”话语分析层次的界定从道德、权力、治理等层面进行阐释(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人民”话语的历史演化

	革命时期	政权建设时期	改革时期
道德层面	阶级动员	文化领导权	历史合法性
权力层面	革命行动	阶级斗争(继续革命)	维稳政治
治理层面	基层政权实践	总体性治理	动员式治理

### (一) 革命时期: 阶级动员、革命行动与基层政权实践

严格来说,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并不是一开始就意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尽管在1923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发出指示称“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要求中共在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农民土地革命,但彼时国共两党正处在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中共并未立即主张激进的农民运动路线。直至工人运动遭到破坏后的1925年,中共四大才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第一次明确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革命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共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sup>③</sup>

①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28-29页。

② 冯仕政《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 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学海》2014年第2期。

③ 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之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篇就抛出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著名论断,<sup>①</sup>明确了敌我划分的重要意义,继而意识到处于国民党城市政权边陲的广袤农村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才是共产主义事业所需要的联盟,并将原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具备的品质赋予给了农民。一方面,将人民群众定义为朋友是之后共产党一切革命政治的初始逻辑,在此基础上所坚持农民群众路线是革命政治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另一方面,坚持“革命性在农村、在农民”的观点也开始赋予群众以革命性。中国由此进入到了农民革命时代。在这一时期,“人民”话语在道德、权力与治理层次分别表现为阶级动员、开展革命行动与开展基层政权实践等三个方面。

首先就阶级动员来说,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但是要唤醒这一沉睡的力量,必须借助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与技巧。在国民党政权时期,农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还夹着经纪人群体,传统帝国的没落使经纪人逐渐从“保护型”转向“掠夺型”,农民处在“地租”与“地租”的双重压榨之下,在乡村社会逐渐积累了一定的社会怨恨,这一怨恨与“苦”亟待有人前来纾解。为了实现社会的革命动员,中共需要创造出更易被底层民众所接受的策略性框架,其中最为显著的工作即是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予以“道德化”。共产党员成立工作队进入村庄后,发动贫雇农的思想工作,组织引苦活动与诉苦大会,开展土地改革。通过这种方式建构农民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强化对旧社会的仇恨、对原有乡村权威的仇视,对原有社会组织的脱离,土改中的诉苦由此构成了一项动员技术。<sup>②</sup>中共在阶级动员所使用的宣传策略是高度“道德化”的,通过把“自然状态的‘苦难’和‘苦难意识’加以凝聚和提炼”,为底层民众带来了全新的意义体系和价值目标。

其次,就革命行动来说,在阶级动员实施成功之后,革命团体面临的议题即是如何在革命行动中保持内部忠诚以此来维系革命行动的问题。中共已经通过土改重新分配了土地,解决了贫苦农民的生计问题,吸引了农民参与革命,收获了农民一定程度上的支持与忠诚,但这显然是不够的。革命团体需要某种全新的意义与价值体系来实现革命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控制,而一支配机制即是通过“人民”话语来赋予底层民众以“人民群众”的革命性身份,赋权给底层民众,使其获得权力的补偿感,实现“翻身做主人”。由此,革命的潜在追随者会将真实的抑或建构出来的压迫感与怨恨转化为自身的认知结构,从而内化为一种持续的忠诚与革命行动力。在这里,“人民”话语充当了中共革命化、阶级化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强化革命团体的内聚性,并鼓舞了以革命行动被导向的内在士气。

最后,就基层政权实践来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逐渐明白,要取代国民党,就要真正做到深入农村的管理,必须建立更为基础性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一点连国民党本身都做不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一个城市性政权,它缺乏广泛动员的能力与基层政权基础,这对共产党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困难,因此只能把农民本身转化为农村社会的管理者。<sup>③</sup>农民是传统社会地主乡绅自治和宗法家族之下的被治理者,这种“转化”看起来很艰难。但共产党抓住了以下几个前提:第一,在国民党政权体系下,中心城市与边陲社会存在着空隙,这些空隙削弱了中心国家与边陲社会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联系;<sup>④</sup>第二,农民必须建立突破家庭且不同于家族的基层组织形态,基层社会中各个层次的管理者要效忠统一的意识形态。第三,通过建立根据地,展开阶级动员与群众识别,发现积极分子,吸收农民入党,建立庞大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会。由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② 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③ 据估算,这个社会组织结构大概需要甲长640万人,保长77余万人,副保长及保干事300余万人。参见张厚安、白益华:《中国农村基层建制的历史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④ 陈明明《在革命与现代化之间》,《复旦政治学评论》(第1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可见,“人民”话语在基层政权实践中也扮演着重要的政治指导作用。通过此一系列方式,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极速扩张,实现了基层组织与政权建设的初步实践。

## (二) 政权建设时期:文化领导权、继续革命与总体性治理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尽快实现经济社会重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第二,诚如吉登斯所说“任何组织以及任何规训的形成,都依赖于事先存在某种专业化的行政官员”<sup>①</sup>国家政权建设自然也不例外,但科层组织具有一种先天性的僵化倾向,因而,如何来平衡“现代国家”与“保持革命底色”的内在紧张?

如前文所述,由于在革命进程中采取的“人民”话语起到了阶级动员、维系革命行动、凝聚内部团结、开展基层政权实践等作用,为之后到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操演,包括人群的辨识、利益的分配、权利的释放、开放领导地位吸纳群众等方面,民众已建立与“国家框架”在精神、利益上的联系。<sup>②</sup>因而,“人民”话语同样成为在政权建设时期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亦或者说,中共在通过革命战争获得胜利之后获得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从文化的角度看,国家政权建设过程实际上也是传统的符号、礼仪和身份标志遭到否定继而被新的形态取代的过程。因而,中共不仅在政治力量对比上,也在道义与伦理上占据了优势,获得了来自历史沿袭的政治合法性。由此,在政权建设中巩固革命政权同时开展社会经济重建之时,“人民”话语也就获得了某种先天上的话语优势,自然而然进入了新政权的政治语库。

诚如戈德斯通所称,革命后国家重建中的社会活力,并不取决于制度变革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制度变革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结构,国家通过强加文化上的一致性来支配物质生产与社会进步。<sup>③</sup>具体到中国的经验情境中来,这种“文化一致性”实际上是中共在革命时期业已熟谙的“人民”话语与“敌我”矛盾辩证法,即通过对人民群众的再次定义与对敌人的再次指认来完成这项工作,一个奠基性的文献是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该文扩大了“人民”概念适用的范畴,对“人民”进行了再定义,<sup>④</sup>并将“人民-敌人”的辩证法运用社会动员与“继续革命”的工作中。

在巩固政权方面,通过采取广泛的忆苦思甜运动、新民歌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文化方面的活动来激发起民众的热情,建构起民众对国家政权的认知与认同,使得村民的政治身份由家族化转向国家的社区化,由地缘与阶级意识转向国家意识与政党效忠。<sup>⑤</sup>通过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强调民众的献身精神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彻底否定“小我”,锻造出面向“大我”、符合革命与国家需要的政治个体,即“共产主义新人”,<sup>⑥</sup>使民众由“被动的卷入”转向“主动的参与”,实现巩固革命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改造社会面貌的目的。

在平衡“现代国家”与“保持革命底色”内在紧张方面,毛泽东希望保持党的纯洁性以及干部队伍革命性。<sup>⑦</sup>他试图通过群众运动这样的方式来拓宽群众的政治参与度,只有让群众行

①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② 张静《解放区时期的群众路线》,《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7-8期;孙立平、郭于华《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杨念群《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7页。

③ 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廷杰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40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页。

⑤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⑥ 参见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刘瑜《因善之名:毛泽东时代群众动员中的道德因素》,王奇生《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6页;程映红《塑造“新人”:苏联、中国和古巴共产党革命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3期。

⑦ 对于毛泽东来说,建国后官僚主义制度的发展,他认为导致了一种危险的社会模式和价值取向,加大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特别是和农民之间的经济文化鸿沟,还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参见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动起来,才能防治官僚主义,防止变成修正主义,<sup>①</sup>因此在经济重建的政权建设过程中,还伴随着以“群众-官僚”对冲为主题的政治议程,要“继续革命”,而这一政治议程仍然是在“人民”话语的指导下铺展开来的,再次操持“人民-敌人”的辩证法,将人民、敌人等概念进行再定义,继而开展相关的政治斗争。因此我们看到,在政权建设时期的经济议程之外,还伴随着反右斗争、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人民”话语也由此爆发出它最暴烈的能量。

无论是以经济建设为主题的社会动员还是以政治斗争为主题的继续革命,都是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在历次政治运动熏染中,革命已经通过政治社会化机制内化于心了,乃至形成了某种与“动员型政体”相匹配的集体人格或曰政治文化。“人民”话语担当了开展政治说服和动员的工具,也是将政治道德化的生产机制,同样也构成了一种对社会进行治理的方式。当然,这种主导性的治理话语也与其他制度安排如城市单位制、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定量供给制等编织构成了总体性的政治治理网络,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个体心智的统摄也是前所未有的,个人与组织乃至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依附关系。

### (三) 改革时期:历史合法性、维稳体制与动员式治理

众所周知,“继续革命”的政治议程带来了深重的政治社会灾难。改革之后,新一代领导人意识到,“意识形态的激励已经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sup>②</sup>但与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紧随的“人民”话语并未因此被悬置,“人民”话语不仅关涉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也关涉社会主义道统的来源,勾连着“未来”与“过去”,因此在革命祛魅的改革之后,对“人民”话语进行了再诠释。

首先,强调“人民”仍是合法性的来源,只是这种合法性的获得不能再依仗过去的道德召唤,而要通过实用主义措施来重塑合法性根基;<sup>③</sup>其次,“人民”话语的敌我二分法将不再适用于新时期,许多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民”范畴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扩展为改革年代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sup>④</sup>最后,革命激情的退潮与敌我二分的消解并不代表矛盾辩证法的退场,“人民”话语仍然具有某种约束与催化效应,借其形成社会冲突化解机制与动员式的治理风格。

所谓社会冲突化解,是以“人民”话语的矛盾辩证法为指导形成维稳体制。1980年代,面对改革初期带来的社会治安状况,开展了群治群防的动员式治理方式,主要通过“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等方式,发展了“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sup>⑤</sup>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分化,导致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不满,出现了集体上访及群体性事件,而地方政府在社会冲突治理过程中过分倚重强制手段使得学术界纷纷抛出了“合法性危机”的论断。<sup>⑥</sup>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官方主导性话语从2007年开始逐渐提出“以人为本、坚持和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这样的新表述,试图重拾群众路线的传统,在处理社会冲突上,注重矫正以往“泛政治化”的做法,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一种由利益意识觉醒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在此,国家重新调整人民与敌人的相对范围,将人民的范围扩大到了几乎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第194页;转引自刘磊《走向法律虚无主义:毛泽东后期法制思想研究》,《山东大学法律评论》(2014)。

②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③ 例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203页。

⑤ 陈柏峰《群众路线三十年》,《北大法律评论》第11卷第1辑。

⑥ 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学海》2015年第1期。

与公民的范围同等大小的地步,<sup>①</sup>“人民内部矛盾”由此回归,但这种回归本质上来说,是重新与延续下来的体制达成形成“动员式治理”,将“人民”再次定义,通过“信访”“人民调解”等“政法传统”来规避社会治理风险,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维持了政治与社会稳定。

所谓动员式治理,是通过观念的建构、奖励与惩罚措施的运作、全社会的动员与目标管理体系的设定,最终实现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目标,这也是“人民”话语的工具性表现。虽然革命远去,然而“动员依然是中国行政体系运作的根本及永久特征”。<sup>②</sup>动员式治理或者说运动式治理的存在表明,在一统体制下,科层制内部权威体制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政治沟通梗阻与政策执行失真现象,同时以文牍、理性为核心的科层制无法与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相适配,因此必须通过某种制度遗产依靠群众性的参与来克服正常的官僚体制能力的局限。这样一种制度遗产就是深植于政体肌理的人民话语,反过来,在动员式治理过程中,不仅能够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同时还可以作为一种纪律性的训诫力量和政策性的社会学习工具,对官僚体系与民众实现规训与整合。只是这一后革命时代的人民话语与动员或运动已经演化为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动员,从而祛除了继续革命语境下人民话语所裹挟着的暴戾气质。

### 三、余 论

“人民”话语作为一项政治表达,构成国家的精神气质和制度基础。那么,“人民”话语如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新表述中实现良性互动呢?这仍要放置在主导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建设的交互关系中来考察。正如邹谠所指出的,“中国革命建国的指导思想是群众观念……群众要求的不是抽象的人权,而是社会经济上的权利。中国革命是从争取社会经济权利开始的,进而要求政治权利,要民主。中国革命和建国的过程是以‘群众’这个概念开始而不是从‘公民’这个概念开始。”<sup>③</sup>这样一种以“人民”话语构建政权的方式获得了天然合法性,“人民”同时又与“先进阶级”“先锋队”“政党”联结在一起,而当前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另一个面向——公共性与公民社会,则仍存在很大空间,这即是孔飞力所称的“根本性议程”中,“政治控制”“政治参与”与“政治竞争”三个议程的不可或缺。<sup>④</sup>毕竟国家政权是不是真的深入社会基层不取决于它是否在基层建立了它的管治机构,而取决于它在扩张自身权力的同时,是否建构了它的支持力量。<sup>⑤</sup>只有当国家建设形成了这种新的社会身份,民众才会认同国家的权威,国家自主性与国家能力由此得以提升,若非如此,则会导致国家能力的悖论。

因此,当我们重新回顾20世纪中国革命以及探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时,应当在考察“人民”这一概念的逻辑圆融性与道德完美性的同时,也应将“人民”理解为一个个的社会行动者,继而发现社会中层组织与民间社会的发育,而“社会”的成长作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它的缺席将导致国家迟迟无法完成转型。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人民”国家的诞生是“最先一公里”,而“社会”的发育成长则代表着“最后一公里”。因而,在重新发现人民、发掘其有益遗产的同时,还应将“人民”话语置于按照理性原则构建起来的“公共性”之下,着力培育社会中层组织与个体自主性。

① 冯仕政《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学海》2014年第2期。

② 黄冬娅《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及其逻辑》,《中大政治学评论》第3辑,2008年。

③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④ 参见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⑤ 张静《基层政权》,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6页;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 **The Discourse of the “People” from a Historical –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xpression and Practice**

Liu Jie/He Donghang

The discourse of the people is a dominant discourse in China's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It was developed from revolutionary mobiliz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as accompanied with soc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period of state power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focusing on examining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political action, as a rhetorical discourse of the people, it has its corresponding practice in the aspects of morality,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it was manifested in class mobilization, revolutionary action and practice of grass-roots regime; in the regime construction period, it was manifested in its resorting to cultural leadership,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holistic governance; in the reform period, it was manifested in being a major source of historical legitimacy, the formation of system of 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the rising of mobilization-type governance style.

### **Composite Politics: Governance Logic of Natural Unit and Administrative Unit**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s from the “In-depth China Survey”

Deng Dacai

The elementary units of China's grass-roots rural area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combination and selection of elementary units determine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elementary units of China's grass-roots rural areas are divided into administrative unit and natural unit, the former has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while the latter has social function, both interact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form a grass-roots “composite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raditional period, both of them were discrete but remained complementary; in the state construction period, they underwent a change from division to combination and developed reversely in their functions, the administrative unit had increasingly mor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which had gradually replaced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natural unit; in the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period, they have shifted from combination to separation again and their functions began to increase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elementary units have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long run,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re will be gradually less social functions and weaker self-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natural unit while there will be gradually more administrative functions and stronger governance capaci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unit.